

读书

D U S H U

2014

上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读书

D U S H U

1

2014

January

欧立德 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陈 宪 政府为什么总是超载？

邓曦泽 加尔通与美帝国：谁是赢家？

李 零 说鼎

王 果 无形而万状的清代士人世界

卢 冶 天气与天才



《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西方汉学经典译丛 张西平 主编

(美)顾立雅 著 高专诚 译

16开 平装 定价 48.00 元 书号: ISBN 978-7-5347-7962-6

自从孔子及其思想影响人类之始,有关真、假孔子的论争就已开始。顾立雅作为地道的西方学者,在这本书中明确表达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景仰,却又与传统的卫道士心态有本质的不同。顾立雅深厚的汉学功底和同中国知名学者的密切交往,使得他的孔子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也是《孔子与中国之道》这本书成为孔子研究领域中的名著,至今还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原因。

大象出版社 2014 年 3 月修订版

联系方式:河南省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大象出版社 0371-63863551 63863513

《读书》编辑部编辑

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10

E-mail:sdxduhu@vip.sina.com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樊希安

副总编辑:潘振平

执行主编:郑勇/王焱

编辑:朱竞梅/饶淑荣/卫纯/运营总监:李学平

装帧设计:陆智昌/薛宇/印制主管:郝德华

发行总监:范于林(010)84050427

发行邮购联系人:朱静 金宇迪(010)84050451 84050425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国内代号2-27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ISSN 0257-0270 CN11-1073/G2

可悲的平等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社会上对大学招生啧有烦言。其中一条是为什么北大、复旦这些名校，对外地考生和本地考生录取分数线大有差别？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外地考生录取线要高于当地学生十几分乃至几十分，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全国的考生都要盯着这么几所高校呢？因为名气大？可这名气大抵是靠先前的老本儿。现在如何？北大如何，我不便置喙；至于复旦，虽为母校，离开几十年，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不过我知道一九四九年前，复旦在上海的高校中并非佼佼者。直到后来院系调整，沪、苏、浙等地许多名师汇集于复旦，这才在全国崭露头角。至于现在，随着两代名师的离去，无论复旦抑或北大，内囊也都渐渐尽上来了。一位当今复旦的名教授极而言之：复旦、北大也都快变成

“野鸡大学”了。诚哉斯言！把复旦、北大这样的名校也办成了准野鸡大学，这魔咒似也难解。争着进这样的名校，了无意趣。

香港，弹丸之地，但那里的科技大学和中文大学不是让国内学子宁可放弃北大、复旦而奔向那方吗？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地域不为不广，财力许多也不为不足，不说全部，能有二分之一也办起那样两所大学，又何必为区区录取分而愤愤不平呢？近几十年，主管教育者大都在教育本身之外玩花活儿，一会儿走向市场了，一会儿什么“二一一工程”了，一会儿又搞高校大合并了，唯独不见把力气放在师资、学术、学风的养成与发展。长此以往，中国的大学，除了其规模之大，人员之杂，恐怕别无所长了。那时，上什么大学已无关紧要。这或许也是一种平等——一种可悲的平等。

短长书

莺莺的秋波公案 吴真3

政府为什么总是超载? 陈宪8

申根随想录 野夫12

邓曦泽 加尔通与美帝国：谁是赢家?19

[美] 欧立德 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29

马思宇 爱恨交织的“帝国主义”41

高全喜 麦考莱和他的《英国史》50

张维迎 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 著译者言61

孙 歌 “自然”与“作为”的契合71

李金松 子之于父：汪中形象的重塑80

品书录88

《爱的教育》九十年（叶小沫）·阿尔都塞的杀妻与被弑（李三达）·全然孤单地留存在世上（黄礼孩）·如何讲述第三世界的

- 赵一凡 王蒙的“中段”104
汪云霞 卞之琳的爱情书写与女性想象114
- 李 零 说鼎122
王 果 无形而万状的清代士人世界132
- 盛 韵 勋伯格，那个得了音乐病的人141
皮 力 出走与间离：徐累绘画中的前卫反思149
卢 冶 天气与天才 倒视镜155
- 沈卫威 话说缪凤林165

读书献疑173

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字小字之别吗？（曹旅宁）

- 刘以林 漫画70
陈四益 黄永厚 画说 封二
-

短长书

莺莺的秋波公案 吴真3

政府为什么总是超载? 陈宪8

申根随想录 野夫12

邓曦泽 加尔通与美帝国：谁是赢家?19

[美] 欧立德 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29

马思宇 爱恨交织的“帝国主义”41

高全喜 麦考莱和他的《英国史》50

张维迎 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 著译者言61

孙 歌 “自然”与“作为”的契合71

李金松 子之于父：汪中形象的重塑80

品书录88

《爱的教育》九十年（叶小沫）·阿尔都塞的杀妻与被弑（李三达）·全然孤单地留存在世上（黄礼孩）·如何讲述第三世界的

- 赵一凡 王蒙的“中段”104
- 汪云霞 卞之琳的爱情书写与女性想象114
- 李 零 说鼎122
- 王 果 无形而万状的清代士人世界132
- 盛 韵 勋伯格，那个得了音乐病的人141
- 皮 力 出走与间离：徐累绘画中的前卫反思149
- 卢 冶 天气与天才 倒视镜155
- 沈卫威 话说缪凤林165
-

读书献疑173

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字小字之别吗？（曹旅宁）

刘以林 漫画70

陈四益 黄永厚 画说 封二

莺莺的秋波公案

吴真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却走进了我的酒馆。”电影《卡萨布兰卡》这句经典台词道尽了机缘的宿命感。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落魄张生路过蒲州，偶至普救寺一游，偏偏就在佛殿撞见崔莺莺。张生第一反应是：“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他“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一边搜肠刮肚地唱赞眼前的神仙姐姐，一边说着“我死也”的疯癫话。就这么一个照面，张生已经悲剧性地预感到“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明清时代，几乎所有的《西厢》评点都指出，“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乃一部《西厢》之关窍。相国小姐莺莺临去时的顾盼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张生也真好眼力、解风情，捕捉到了这一转秋波的无言鼓励。晚明行销一时的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批道：“张生也不是俗人，赏鉴家！赏鉴家！”

临去秋波那一转的美人意态，在张生看来，“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着实令读者浮想联翩。现存六种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西厢记》，卷首均收入一幅款识为“吴越唐寅摹”的《莺莺遗艳》小像，据说这幅小像是唐伯虎《莺莺折花图》的印刷版。画中莺莺侧着芙蓉脸，支颐微笑，端的是宜嗔宜喜春风面，回眸一笑百媚生。明代坊间还流传着一幅传说是南宋画院待诏陈居中的《崔娘莺莺真像》，

正统年间，祝枝山说他曾看到过这幅陈居中版的莺莺真像：“继于礪城僧院中见一本，大略相类，妖妍宛约，故犹动人。”（《怀星堂集》）

礪城就是现在的上海市嘉定区。祝枝山这段话的亮点在于，这幅“莺莺真像”收藏在僧院中。可是，僧众们每日价凝视这“妖妍宛约”的莺莺写真，是否有碍于清修呢？

晚明文人圈流传着一个段子，表明“莺莺真像”不仅可供把玩，更有启发禅悟的奇妙功用。据说明中叶的武英殿大学士丘濬，某日曾至某佛寺，见四壁俱画《西厢》。丘濬惊问：“空门安得有此？”僧人从容答来：“老僧从此悟禅。”丘学士不解：“何处得悟？”答曰：“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禅有活参，亦有死参。僧舍画《西厢》，以“莺莺真像”悟禅，当属以空传空的活参。“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妙就妙在十字之内，有莺莺的秋波，更有张生“怎当他”三字的勘破。当日莺莺“蹀着香肩，只将花笑捻”，观看者不仅有张生，亦有和尚法聪，可是勘破莺莺风情，被莺莺“风魔”的只有张生。张燕瑾注说：“相传释迦牟尼于灵山会说法，拈花示众，众不解其意，惟有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后遂以拈花微笑喻心心相印。此化用其意。”考虑到“捻”与“拈”都是用两三个手指头夹取东西，捻花微笑与禅宗“拈花一笑”确有某些共通的深意。

莺莺走到门前“临去秋波一转”，以目传心，被张生觑出那么点意思来，一旁的法聪犹自懵懂，于是，张生意犹未尽、喋喋不休地向法聪详解那莺莺如何“眼角儿留情处，脚踪儿将心事传”。这个场景，活脱就是佛寺参禅时已悟弟子不无得意地向懵懂同门讲解“如何是佛祖拈花意”。

如此看来，僧人也许是在莺莺“将花笑捻”的画像里，体味着类似于拈花一笑的电光石火，深味到了勘破“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喜悦。如此活参，令无数风流才子玩味再三，崇祯年间，冯梦龙的《情史》、《古

今谭概》和张岱的《快园道古》都收录了这个故事。

关于从《西厢记》悟禅的问题，晚明还有另一个故事。《耳谈》讲到一则朱元璋微服私访的故事：“太祖高皇帝，尝微行，过一寺，见扮《西厢记》者，曰：‘空门安得扮此？’僧对曰：‘老衲从此悟禅。’曰：‘从那一句悟？’对曰：‘乃是怎当他临去时秋波那一转。’帝已颌之。”

其实早在宋代，禅师们就常常“竿木随身，逢场作戏”，凭借角色扮演来修证禅悟。朱元璋遇到的这位老僧看来是位“西厢粉”，居然在佛寺里组织搬演《西厢记》，只是不知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妙目顾盼情态，和尚如何扮得？《耳谈》最后一句说，对于这种通过艺术方式探讨参禅的行为，朱元璋是报以点头称许的。

有好演剧悟禅者，自然也就有好观剧悟禅者。崇祯年间，闵遇五在《会真六幻》序言中说道：“昔有老禅，笃爱斯剧，人问：‘佳境安在？’曰：‘怎当他临去时秋波那一转’。”闵氏叹道：“此老可谓善入戏场者矣。第犹是句中玄尚隔玄中玄也。”表扬老禅师独具慧眼，能从戏文中拈出这句最是“玄中玄”的玄语，“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袖手旁观可也”。

《西厢记》之文、之戏、之画，在老禅师的眼中，在在俱是禅悟之机。这种新鲜的参法，正与晚明“以情悟禅”之风合拍，所谓证得“色空不二”是也。崇祯年间的徐士俊《古今词统》有一评语说得切：“怨女狂夫并为佛子，读者果能会得此意，则秋波一转，亦是禅机一部，《词统》无异《五灯会元》耳。”

到了清代初年，禅林就有了一桩公案叫作“临去秋波那一转”。禅宗的公案类似法律的案例与范例，主要记录在著名禅师的“语录”、“灯录”之中。公案是禅门中人的共同知识，禅师每开示一桩公案，无须详解来龙去脉，门人就已知其机锋所在。

顺治年间，广西曹洞宗的大和尚德宗，借此公案来讲解《摩尼珠颂》的妙处：“于中那转秋波趣，不是风流人，岂明此颂句到、意到、理到、

事到？”本来话说到这里已经够明白了，可还是有些学生不知是故意追问还是不解求教：“请问如何是那转秋波趣？”德宗答：“只许佳人独自知。”学生还是不依不饶：“不是风流人岂明？又作么生？”

所谓“又作么生”，是禅师在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时候常用的反问句，意思是那又如何、那又怎么样。面对如此不识趣的木头，德宗和尚只好无奈地说：“深领。”——你自己好好琢磨去吧（《迳庭宗禅师语录》）。

尤侗曾经模拟张生的语气，写了一篇八股制义《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结构严格按照八股文的起承转合，语气却是绮丽的“西厢体”。文章结语处，尤侗给读者布置了功课：“抑老僧四壁画《西厢》，而悟禅恰在个中。盖一转者，情禅也。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尤侗指明秋波一转乃是“情禅”，要求读者根据自己的参禅体悟“下一转语”，就是给出勘验、印证机锋的个人心得。

“一转语”在禅宗公案问答中至关重要，若悟境不彻，一转语就会下得牛头不对马嘴。《景德传灯录·百丈怀海禅师》甚至说：“古人只错对一转语，五百生堕野狐身。”可见是否下对一转语是禅师悟性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里，禅宗话语体系中的一转语，恰好跟《西厢》戏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形成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因此，尤侗的八股制义虽是戏谑之作，却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何是那转秋波趣？

游戏八股文一出，传诵者众。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此文传抄到了顺治皇帝手里。顺治十分倾倒，专门找来弘觉禅师一起参详：“请老和尚下。”弘觉回答：“不是山僧境界。”当时弘觉的大弟子天岸异也在旁侍听，顺治转头又问：“天岸何如？”天岸答道：“不风流处也风流。”

师徒两人的一转语，各有千秋。身为丛林领袖的弘觉和尚避开机锋，似答非答，既可理解为“山僧不识风流趣”，又可理解为“山僧境界尚有欠缺”，还可理解为“眼前意”，一种公案问答的惯用技巧。此

种妙处，正如赵州和尚以“庭前柏树子”来回答“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是将形而上的“秋波趣”拨转为形而下的“眼前意”。

天岸“不风流处也风流”出自宋僧子益的名诗《赵州勘婆》：“尽道赵州勘婆子，不知婆子勘赵州，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诗中称赞赵州和尚勘破五台山婆子，显示随处作主的禅意。后来“不风流处也风流”逐渐成为公案问答中的“万能答案”，用于应付“即心即佛”相关的所有机锋。天岸昇不愧为弘觉的首座弟子，将这句“大路货”用得恰到好处。莺莺的秋波那一转，恰在“情不情”，风流不风流之间。

据《弘觉恣禅师北游集》记载，顺治对于弘觉师徒的一转语颇为满意，“上为大笑”。这本《北游集》记录顺治曾多次与弘觉讨论《西厢记》曲文，据说顺治还批阅了新鲜出炉的金圣叹批点《西厢记》的才子书，评价金圣叹“才高而见僻”。有了这些共同研习《西厢记》的经验，才有了后来在勘破“如何是那转秋波趣”之时，皇帝与禅师，于戏文、于公案皆达到“如来拈花、迦叶微笑”的默契。

整整一部《西厢记》，由普救寺佛殿上“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而起，崔莺莺与张生的相遇相爱皆发生在佛寺西厢，玉成崔张姻缘的又是普救寺僧人法本、法聪，可以说，《西厢记》文本早与佛教“结缘”。佛殿撞见莺莺时，张生感叹：“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谁又能预想到，“临去秋波那一转”也令明清之际的禅僧们拾得万种思量？莺莺的临去秋波，被丛林中人独沽一味，成了高级趣味的禅门公案，僧人士子们，机锋往来于“那转秋波趣”之间，以情悟禅，自色悟空，穿过《西厢》之方便法门，到达禅悟之彼岸。

清初岭南曹洞宗的函昱禅师说过：“世尊拈花是一出好戏。”禅眼观之，戏与禅本是一味，一出好戏，亦是一宗好公案。元代的高则诚写《琵琶记》，一开场就祈求读者观众说：“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西厢记》何其幸运！这一等禅僧，便是那另做眼儿看的千古知音。

政府为什么总是超载？

陈宪

看到标题所示的问题，人们容易联想到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先后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这只是问题比较集中的暴露，“超载国家”或“超载政府”（为保持一致，本文用“超载政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在以后的一些著述中开始有相关论述。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中，将“超载政府”及其理论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福利制度面临危机的一种解释。另一个解释是所谓“合法性危机”及其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五年被许多人描述为一个认同、笃信权威和合法性的时期。漫长的战争似乎造成了人们对于新时期的强烈承诺与期望，这个新时期的特征是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发生的进步性变革。”（297页）“新政治”作为这一变革的产物，其“边界的标志在于：在致力于政治和经济变革、尊重立宪和代议制政府、维持与国家或公众利益的有关政策的同时，积极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这些看法的深层观念在于：国家是促进个人和大众福祉的最佳手段”（298页）。

这种福利的或“社会民主”的或“改革式”的政治观，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发展民主论的思想和原则。但是，它最清楚地体现却是在现实政治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膨胀的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国家的政策中。那些年，迅速的经济增长资助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计

划。但是，随着七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活力的衰落，福利国家开始失去其吸引力，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抨击，左派认为它几乎没有真正削弱特权者和豪强者，右派则认为它代价太高，威胁到个人自由。由此，“民主的危机”出现了。

超载政府理论（305—309页）试图对这一原因给出一种解释。解释的逻辑是：出发点是多元政治理论。这一理论常以权力分散来刻画权力关系：许多代表着不同利益的或互相竞争的集团分享权力并进行权力交易。因此，政治输出是多种过程和多种压力的结果，政府努力对种种需求加以调节和仲裁。这一理论的时代背景，是“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成功的早期，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众的富裕程度有了普遍提高，并产生了战后年代的普遍繁荣，比如，消费品、新住宅、电视和娱乐业的空前发展。与高标准生活相联系，也与对权威和地位的“尊崇”或尊重的下降，人们的期望提高了相关，比如，收入和福利的年增长，足够的学校和高等教育。在这种背景下，利益集团学会了如何对政治家和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能够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要求，如高工资，又如产业保护等。

政治家怎样应对呢？为最大限度地获取选票，政治家们过于经常地许诺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有时还许诺满足互相矛盾的，因而是不可满足的多种要求：政党间的竞争造成了许诺越来越大的螺旋怪圈。因此，人们的期望愈加增强，政党被视为达致更高生活水平的互相竞争的手段。在政府里，由于害怕失去未来的选票，政党都过于频繁地采取和稀泥战略。这一战略及行政管理人员对私利的追求，导致了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且比例失调。“无个性”的官僚机构得到了发展，而它们常常无法实现最初为之设计的目标。面对诸如管理项目成本的不断增长这类问题，国家愈加无力实施有效的管理。公共开支变得太大，而通货膨胀不过是这类问题的一个症状。随着国家的膨胀，它逐渐破坏了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即“私人自由活动”的空间。由此造成

了恶性循环，它只能被“坚毅”、“果断”的领导所打破，而这种领导对于民众的压力和需求则反应迟缓。可见，所谓现代民主国家的超载政府是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

“超载理论家基本认为，对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来说，民主制度的形式和运作过程基本上已失灵（*dyfunctional*）。”（310页）“相形之下，合法性危机理论家们则认为，只有集中考察阶级关系和资本加诸政治的限制，才能为理解危机倾向奠定正确基础。”（310页）合法性危机理论（310—313页）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它指出，政治上，政党之间为了政治权力而竞争，政治输出严重地受制于社会矛盾；经济是通过社会化生产，即通过人们互相依赖的复杂网络进行生产。组织生产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在战后年代，“凯恩斯主义国家”导致了持续二十年的发展。然而，经济不稳定与生俱来，发展时常因为危机而中断。国家不断致力于调节经济，维持政治秩序，以保障主要利益集团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被迫承担生产和福利成本的日益增长，其内在的复杂性及自身成本也在增加，进而，伴随着通货膨胀，公共财政危机更加恶化。由此，不同立场的政府周而复始，政策则变化无端，难以颁布长期连贯的政策。国家对经济和其他领域越来越多的干预，使选择、计划和控制问题变得引人注目，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信心从根本上受到破坏，这种变化转而刺激了对国家的更大需求，比如，要求参与和决策咨询。如果这些需求在可行的各种方案中不能得到满足，国家就会面临“合法性和激励危机”。围绕收入分配、对工会的控制、公共产品的性质和质量这类问题展开的斗争，可能会超出现存经济管理和政治控制机构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国家”：它置秩序于任何其他事务之上，它压制异议，有力地化解危机，或者，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代议制政府逐步使用越来越“铁腕”的策略。如果上述情况之一发生，就可能启动恶性循环。然而，不能排除制度根本转型的可能性：它不

可能是一个颠覆推翻国家权力的事件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一个过程，即现有秩序的再生产能力的持续削弱和另一些制度逐步出现，这些制度如：把更多产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的国家机构；依据需要而不是利润而持有更多资源的国家组织；民主延伸到工会和地方社区。

在经历了二〇〇八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后，“超载政府”和“强国家”都在现实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欧猪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民主国家福利制度导致的严重的“超载政府”的例证。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现行体制迥异，但在危机后出现的某些情形，已经并将继续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强国家”合法性危机的各种症候。显然，“强国家”有一个升级版的“超载政府”，尽管二者的逻辑有所不同。

合法性 (legitimacy, 或译为正当性) 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学概念，通常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约翰·洛克曾经说过，“政治正当性来自被管治者的同意”。当今政府合法性最普遍的来源是执行民主政治和顺应民意。政府时常提出符合民意的法令来实行治理，然而，这类法令的来源因政权不同而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民主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其定期的、自由公正的竞选的基础。在中国现阶段，政府合法性集中地表现在持续改善城乡居民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上，与此同时，也在寻求能够达成上下共识的走向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方式和道路。

无论是民主国家政府合法性遭遇的挑战，还是中国建立政府合法性的进程，都深刻地表明，持续地改善决策的可塑性，把握和推进向某个目标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戴维·赫尔德指出：“应当强调的是，对现代民主国家面临的危机的这两种不同解释都集中在‘导致转型’的危机的可能性上。超载理论家视之为对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危险而提出明确的警告（并提出了遏制和控制的建议）；‘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家却认为，这既造成了政治的两难困境，也提供了进步性重大变革的可能性。”（306页）